

坦桑尼亚史

〔坦桑尼亚〕 伊·基曼博 主编
阿·特穆

商 务 印 书 馆

25.557
538
:2

坦桑尼亚史

下 册

[坦桑尼亚] 伊·基曼博 主编
阿·特穆

钟 丘 译

350/5

商 务 印 书 馆

1973年·北京



第六章 改良和分化的 时代(1907—1945年)

123

约翰·艾利夫

改良和分化

尼雷尔总统在他的《社会主义和农村发展》的论文中指出，“传统的”非洲社会有两个显著的弱点：一个是妇女的社会地位低；另一个是贫困。他论证说，第二个弱点“只是两件事造成的：第一是无知；第二是行动的规模”。^①无知和不团结确实是殖民地时期以前坦桑尼亚存在的问题。本书的前一章表明，坦桑尼亚各部族抵抗德国人入侵之所以遭到失败，正是由于这两个问题：他们的无知，指的是技术上处于劣势；斗争的规模小，使他们只能单独作战而被各个击破。马及马及起义是

^① 尼雷尔：《社会主义和农村发展》，1967年达累斯萨拉姆出版，第3页。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尝试。起义的领袖们企图依靠纯粹信仰的力量来做到这一点。他们的马及^①使他们有可能在较大的范围内实现团结，而且使他们相信可以使欧洲人的武器失去作用，从而克服技术上的劣势。信仰确实暂时达到了实现较为广泛的团结这个目的。但是起义证明，仅仅依靠信仰并不能克服技术上的弱点。马及马及起义以后，坦桑尼亚人不得不寻求其他的方法，寻求比长矛更有效的东西。

本章论述的是，在马及马及起义以后的年代里，坦桑尼亚人为了解决不团结和无知问题，做了那些事。他们把大部分精力花在解决无知问题上。他们试行了许多方法，但是几乎所有这些方法都
124 可以用“改良”这个词概括起来。这就是说，努力使人民和各部族的处境变得更好一些，同时又要使他们更有能力以平等的地位同他们的统治者打交道。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重点是教育、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的现代化。它不象马及马及起义那样带有戏剧性，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而不如马及马及起义那样引人入胜和英勇壮烈。马及马及的英

① 见本书第5章第225页注②。——译者

英雄是武士和预言家；而改良时代的英雄则是乡村教师、店主、办事员和棉农。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的经验驱使这些人相信，他们的部族社会在技术上比欧洲人差。因此，他们想要把那些他们认为使欧洲人强大起来的东西给予他们的部族社会。如果这种做法不是意味着抵制殖民主义，而是加剧殖民主义对他们部族社会的冲击，那么他们也愿意这样做。有时候，他们只是单纯地想要模仿欧洲人。但通常他们是比这种单纯的模仿更有鉴别力的。然而这两种做法都使他们难于同殖民统治进行公平的较量。实际上，尽管坦桑尼亚人也许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实践中却被迫承认殖民统治的存在，并致力于在这个统治的范围内改善他们的地位，直到他们能够在多少有成功希望的时候再向它挑战。他们必须为后代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自由。然而，他们所作出的牺牲是有限度的。即使那些最热衷于在殖民统治范围内发展自己的人们，也决心对这个进程保持某些控制。他们要求保证学校教必要的东西，或者要求按照正确的方针改革经济。同殖民主义者相比，他们往往要求改良实行得更快一些，而这

就会引起冲突。在这一时期，尽管没有公开的战争，然而坦桑尼亚人不是消极的。通过学校寻出路的人不是消极地接受殖民统治。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是欧洲人使非洲人得到改良，而是非洲人自己努力实现改良。

有些部族比别的部族有较好的条件改善自己。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进学校和找到理想的职业，或者他们的土地比较肥沃和接近铁路线，因而他们能从种植和出售农作物获取较大的利润。在改良的时代，有些坦桑尼亚部族积累财富和接受西方教育的速度比其他部族快得多。结果，坦桑尼亚各部族发生了分化。此外，在同一个部族内部，¹²⁵有些人比起别人来有较好的机会和更大的抱负。他们住在学校附近，或者他们的父母已经受过教育能够教他们。他们的亲属中有掌握政治权力的酋长或头人，可以利用这种权力获取进一步的特权。他们耕种最肥沃的土地，或者能够获得这种土地。在殖民统治以前，大部分坦桑尼亚部族已经存在某种社会分化，而在改良的时代，这种分化扩大和加深了。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到经济上形成阶级的迹象。无论是对部族或者个人来说，

改良的时代同时也是发生分化的时代。这方面可能存在的危险性那时还没有显露出来，因为当时人人都处在殖民统治之下。人们常常认为，任何形式的改良都是好的，不管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不平等，因为所有这些改良都在技能总库中增添一份财富，非洲人能够用它来对抗欧洲人。然而，当时有些坦桑尼亚人，或者由于他们不是特权阶层，或者由于他们具有非凡的社会觉悟，他们对于改良在非洲各部族内部引起的分化感到吃惊。兰杰教授在本书其他部分叙述了他们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

无知不是唯一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不团结。在这个时期，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注意得较少，因为看来当时无知是更严重的敌人。然而，人们从来没有完全忘却曾经鼓舞马及马及起义的团结理想。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人们作出了新的努力，运用通过改良所获得的新方法和新思想来团结坦桑尼亚人。这些努力的真正开始大概是在1945年。本章从1907年早期争取团结的努力失败开始，写到1945年为止。当然，1907年到1945年不是坦桑尼亚人实行改良的唯一年代。他们一

直是这样做的，并且将来还要这样做。因此本章有时候越出这个时期的范围，例如讲到十九世纪为克服无知而作出的努力，以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对于缺乏教育事业的抨击。还要指出，有些部族对于改良措施关心迟于其他部族，而有一两个部族则对改良从来不发生多大兴趣。不管怎样，从1907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期，改良的确是坦桑尼亚历史的中心主题，也是促使整个国家发生变化的主要源泉。

126 本章不是这个时期的编年史。改良的过程带有个人和地方的特点。它在个人和个人之间以及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之间都不相同，没有一个划一的、适用于一切的模式。本章试图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特别是当时在坦桑尼亚发生的社会变化。它首先叙述坦桑尼亚各部族对于西方教育和传教士活动的不同反应；然后考察一下商品农业的开始以及农村地区发生的变化；接着叙述城镇的成长，特别是达累斯萨拉姆的成长，以及城镇居民建立起来的组织和生活方式。最后，本章将谈到全领地意识^①的早期表现以及建立全

^① 原文为 territorial consciousness。——译者

领地性组织的努力。

对于教育和基督教的反应

本书前一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同的坦桑尼亚部族对于欧洲人的入侵作出不同方式的反应？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对于这些部族的后期历史说来，也许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他们对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以及往往随之而来的教育活动所带来的威胁和提供的机会，作出了怎样的反应？这种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部族后来进行的改良有那些特点。环境和反应的差异之大，使我们不可能作出包罗万象的解释，而只能作一些概括的叙述。

传教士对于许多部族可以是有用处的。大的、集中的、没有为战争而全部组织起来的部族，往往可以从一个有文化的行政机构中得到好处，而传教士能够为这样的机构训练官员。在基督教传教士到来以前，有些坦桑尼亚部族已经利用伊斯兰教师做这项工作。因此，当传教士路德维格·克拉普夫在1848年访问乌桑巴拉的金韦里国王

时，他发现国王“经常有斯瓦希里人在他的身边为他写各种信件。国王有两个儿子，他们也都成了穆罕默德的信徒，而且学会了读和写。”^① 尽管如此，金韦里需要更多的教育。他劝克拉普夫在乌桑巴拉定居下来当教员，并且最好有一个医生同他一起来。十九年以后，金韦里的继承者指示另一个来访的传教士讲授他的教学方法，然后允许¹²⁷他在郊外定居。有些传教士被看成是商人，对于他们的反应就不那么有利了。例如沿海地区，所有传教士在那里的活动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因为那里的人民出于宗教和商业上的原因，显然是不欢迎他们的。例如 1913 年，柏林路德派教会在扎拉莫族地区只为三百八十二个皈依者举行了洗礼，而在尼亚库萨族地区却有二千二百二十六人受洗礼。尼亚库萨族地区主要是把传教士当作商人来欢迎的。他们在 1891 年到达以前，尼亚萨湖的商业系统只对那些住在沿湖地带的酋长们有利。传教士想要深入内地，在更有利于健康的高原定居。高原的酋长们把他们作为商人来欢迎。

^① 克拉普夫：《旅行、调查和传教》，1860 年伦敦出版，第 279 页。

有一个传教士解释道：“迄今白人只访问了沿湖的酋长。现在他们终于来到他这里了。因为我们(传教士)带到这里的棉布是值钱的；而更好的是，我们在这里出现也许可以制止马关瓜拉(恩戈尼)族的袭击。”^①这个解释说明了欢迎传教士的另一个理由：他们可以被看作政治上的盟友。由于这个原因，桑古族的梅雷雷酋长同路德会的传教士们热情地通信，因为他认为可以通过他们同德国军队接触，而他正需要利用德国军队去对付他的敌人。在一个很不相同的情况下，邦德族为了对桑巴拉族的基林迪统治者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把马吉拉的中非大学传教会(UMCA)的传教士当作盟友。

不同的政治环境可以使非洲统治者对传教士采取敌对态度。例如哈亚族的酋长们长时期反对一切传教活动，可能是由于他们看到了这种活动在毗邻的布干达造成的混乱。凡是传教士几乎和德国政府同时到达的地方，他们往往面临一些特殊的问题。白衣神父到达姆布卢的时候，那里刚刚

^① 梅伦斯基：《在尼亚萨的德国劳工》，1894年柏林出版，第200页。(A. Merensky: «Deutsche Arbeit am Njassa»)

爆发过一次未成功的起义。他们在一片神圣的丛林中定居了两年，一直受到抵制，然后才移居到别处去。后来，他们再次受到抵制，然而这一次他们可能还遇到了由原来的伊拉库宗教领袖领导的、强大的精神对手。当时发生这种情况的事例必定比现在可能表述的要多得多。例如，路德会的传教士们在进入尼亚库萨族地区时曾经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却几乎马上同当地对于姆巴西的个人崇拜发生了冲突。这个冲突也导致对教会的抵制，而且可能是1897年尼亚库萨族同德国当局发生武装冲突的根源。不论传教士对世俗有多大的好处，他们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挑战。许多部族抵制这种挑战，有些部族则欢迎它。不只是奴隶才感到十九世纪的迅速变化使人困惑和压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东非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了，而千年至福说的预言对于坦桑尼亚人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所以，内瓦拉族的马托拉酋长对他见到的第一个传教士说，他希望这位传教士从他的领地清除巫术。不仅如此，基督教如同在它以前的伊斯兰教所起的作用一样，可以扩大坦桑尼亚人在社会上和别人接触的范围。有一段记

载表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相当偏僻的尼亚库萨族地区，教会所起的这种使人们聚集到一起来的作用，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在乡村教堂的布道会上，非洲牧师们反复讲到一个事实，即他们的信徒同其他部族和其他教派的信徒是在一起祈祷的。”^①

早期的传教士对于他们所接触的各部族的影响比起非洲基督徒在这些部族中的影响要小。传教士经常带着非洲的教徒同行，而且很依赖他们。例如，尼亚库萨族地区的传教士在长时期中除了他们的南非和马拉维的随从以外，无法同任何人直接谈话。中非大学传教会的传教士依靠他们在桑给巴尔训练的自由奴隶，圣灵会的神父依靠从他们的巴加莫约居住点带来的自由奴隶，而本笃会^②传教士则依靠他们在库拉西尼训练的人。这些人成为第一批教师。他们的才能和整个教学过程使得富有冒险精神的青年人着了迷：

① 莫尼卡·威尔逊：《尼亚库萨部族的宗教仪式》，1959年伦敦出版，第171页。

② 本笃会(Benedictines)，意大利天主教最早的修道会，创建于六世纪。——译者

第二天早晨，我看到另一批小孩集合在一间大茅屋里，由一个年龄较大的孩子坐在前面带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读：“A, B, C, D……”我被吸引住了，以为这是在唱歌，但这实际上是我们教区的第一所学校。^①

最重要的是，由于年轻一代被早期的教会活动所吸引，他们接受教育和信仰基督教的行动往往表现为几乎是整个年青一代对老一代造反。第一批非洲教师和非洲圣经教员认为他们是新社会的先知。在布哈亚的一个圣经教员写道：长老和原来的宗教领袖的集会“只不过是心怀不满分子和反动分子的俱乐部，而我的房子则是对美好将来抱着纯洁和热情期望的青年人的集合场所”。^②这些热心肠的人很少懂得教育和宗教之间的区别，而这正是后来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个未来的教士清楚地回忆了他参加传教活动时的混乱的动机：

^① “基隆吉的卡农·科伦巴·约哈纳·姆西加拉教士回忆录……始于1955年7月”，伦敦USPG档案，UMCA D/3。

^② 尼哥拉斯·穆贡戈：《一个黑人传道师的回忆》，基巴拉巴拉牧师中心出版，出版日期不详。（Nicolas Mugongo: 《Les Mémoires d'un catéchiste noir》）

一天，我们从学校出来，我们说：“让我们继续学下去，直到我们真正懂得了。”另一个说：“让我们继续学下去，直到我们挂上十字架。”这时我们已经知道，挂十字架的人(圣经班的学生)才真正懂得他教的是什么……。第二天早晨，我们告诉这位老师，我们要他教我们，使我们能够挂上十字架。他非常高兴，并且教我们了。到了月底……我们都成了圣经班学生。^①

在殖民统治确立以前就建立了传教会的地区，非洲统治者小心地保持他们自己对传教活动的控制。基林迪的国王有一个时期禁止邦德的传教士建筑一座永久性的石头教堂。国王最后同意了，“说他同我们没有争吵……但是他宣布，他象他的祖父一样是全王国的首领”。^②在梅鲁，两个传教士由于没有取得正式批准就占有土地而被处死。这些早期传教点的统治往往是十分严酷的，

① 曼弗雷德·马本多：《一位同生共死的非洲朋友》，英国威斯敏斯特出版，日期不详，第14页。

② 安德森—莫斯黑德：《中非大学传教会史》，第1卷，1955年伦敦第六版，第154页。(A. E. M. Anderson-Morshead:《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ies' Mission to Central Africa》)

这部分地是由于安全没有保障。例如，马吉拉传教点有它自己的警察，当学生在一次饥荒中对于缺乏粮食表示不满的时候，“他们全体受到警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免费赐与的，如果谁不满意，他们可以回家。”^①在第一批建立的修道院中，有些是容易离开的，而许多人在感到不能忍受教规的约束时也确实离开了。另外一些就不那么自由了。例如，在邦德的姆库齐差会驻地，许多早期学生是由他们的父亲领来的。他们的父亲接受了一笔现款，如果这些学生想要辍学，他们的父亲必须归还这笔钱。绝大多数传教士不仅有严格的教规，而且不论是从那个教会来的，都采取某种欧洲式的行为标准，并且急于要他们的信徒适应这种标准。当马吉拉举行第一次基督教婚礼时，传教士作了以下的记载：

父母亲、男女朋友们、新郎和新娘都坐在一起，在同一张桌子进餐。新郎和新娘坐在桌子的上首，新郎和新娘的父亲坐在下首。这确实是一次伟大

^① 马吉拉地方志 (Magila log-book), 1884年5月16日, 达累斯萨拉姆国家档案。

的行动，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进步。这是对许多习俗的挑战。^①

早期的许多皈依者经历了第一次冲击以后，几乎同传教士一样急于要向旧习俗挑战。1895年在马吉拉召开的土著基督教徒会议宣布：“一切基督教徒都不准为死者哀悼，因为这是一种异教的风俗……。这样做的人是有罪的，他必须被逐出教门。”^②

传教活动引起非洲各部族分化的趋势，在殖民统治以后建立的差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些差会的发展往往比老的差会快得多。这是征服造成的明显后果之一。卢库勒迪的头人对驻在他的辖地的第一批本笃会传教士说，他不会阻挠他们，“任何人如果不了解现在的时代是属于欧洲人的，那末他就象一个儿童那样幼稚无知。因此，我通知你们，我的孩子们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按照欧洲的方式学习。我不会阻挠他们。”^③ 在所有传

① 马吉拉地方志，1887年8月29日。

② 马吉拉地方志，1895年9月。

③ 西里勒斯·韦尔迈斯特：《在风暴面前》，1906年圣奥蒂利恩出版，第38页。（Cyrillus Wehrmeister：《Vor dem Sturm》）